

ZHONGGUO MAKESIZHUYIWENLUN
ZHONGDA ZHENGYIWENTI TANXI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 重大争议问题探析

胡 海 杨青芝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改革研究课题
河北大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重大争议问题探析

胡 海 杨青芝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重大争议问题探析/胡海,杨青芝著.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4
ISBN 978-7-81097-679-4

I. ①中… II. ①胡…②杨…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4083 号

责任编辑:杨显硕 梁志林
封面设计:王占梅
责任印制:闻利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天普润印刷厂
开本:1/16(710mm×1000mm)
字数:250千字
印张:13.5
版次:2010年4月第1版
印次: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1097-679-4
定价:28.00元

目 录

导论：区分价值分歧与学理之争	(1)
一、《讲话》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	(2)
二、胡风与讲话派文艺思想的根本分歧	(4)
三、学理之争与价值之争混同的学术思路	(8)
四、本书的主要议题	(10)
第一章 人性与阶级性	(13)
第一节 “问题与主义”之争	(14)
一、论争概况	(14)
二、胡适的学理方法对毛泽东的积极影响	(15)
三、毛泽东与胡适的根本分歧	(17)
第二节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	(18)
一、论争背景	(18)
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要点解读	(19)
三、阶级工具与宣传方式	(24)
四、大众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25)
第三节 胡风的批评立场	(27)
一、对林语堂之“个性”或“性灵”的批评	(27)
二、《张天翼》论的人民性立场	(31)
三、钱谷融的“人学”呼应	(33)
第四节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37)
一、周扬的理论历程	(37)
二、从批判个性主义到回归“人”的中心	(39)
三、阶级观念的终结与人学的兴起	(41)
第二章 典型问题论争	(44)
第一节 胡风与周扬典型观的同中之异	(45)
一、论争过程与双方主要观点	(45)
二、双方观点的异同与分歧实质	(47)

三、典型范畴的历史内涵	(48)
四、文艺理论家与政治伦理家的分流	(51)
第二节 典型范畴的现代转换	(54)
一、典型与类型关系的再审视	(54)
二、再现与表现的动态关系	(57)
第三章 两个口号之争	(61)
第一节 焦点文献分析	(62)
一、论争的前因和背景	(62)
二、《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63)
第二节 政治策略与启蒙立人思想的冲突	(65)
一、鲁迅的人学思想	(65)
二、胡风将启蒙和救亡统一起来	(67)
三、鲁迅阐释的历史矛盾	(70)
第三节 历史主义原则与人学批评尺度	(72)
一、立足人生和文艺的批评	(72)
二、胡风的批评理论与讲话派文论比较	(75)
三、历史观点与人学观点	(76)
第四节 文化人学视野的多元价值与主导价值	(79)
一、文化人学的价值思考	(79)
二、文化研究兼容多种价值立场	(80)
三、启蒙思想是文化研究的先导	(82)
第四章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	(86)
第一节 民族形式论争的渊源与旨归	(86)
一、胡风对大众化运动的回顾与总结	(86)
二、瞿秋白强调民族形式的观点	(88)
第二节 胡风反对民族形式的实质	(91)
一、新文艺传统的定性	(91)
二、胡风的民族形式观念	(94)
三、雅俗之争与大众文学问题	(95)
四、主体的价值立场与思想倾向	(98)
第五章 主观战斗精神论之争	(100)
第一节 焦点文献分析之《论主观》	(100)
一、“主观”的决定性地位	(101)
二、个性、自由与“重客观”的矛盾	(104)

三、机械—教条主义	(106)
四、《论主观》的逻辑与学术思路	(113)
第二节 主观战斗精神论	(116)
一、厨川白村和鲁迅文艺观的影响	(116)
二、人本思想和理性精神	(120)
三、主观战斗精神论与《讲话》的对立	(123)
四、黑格尔哲学和胡风所反对的两种创作倾向	(125)
第三节 “五把刀子”与“现实主义”	(129)
一、胡风只是反宗派主义吗?	(129)
二、作为文论体系名称的“现实主义”	(132)
三、思想解放时代的小结	(136)
第六章 形象思维问题论争	(138)
第一节 形象思维探源	(139)
一、俄苏语境中的“形象思维”	(139)
二、胡风形象思维论的实质	(141)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形象思维问题论争	(145)
一、第一次论争	(145)
二、新时期的形象思维问题论争	(148)
第三节 形象思维论的进一步清理	(153)
一、科学领域	(153)
二、意象	(156)
第七章 文学定义与边界之争	(160)
第一节 文学越界与扩容问题	(161)
一、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	(161)
二、文学边界与文艺学的边界	(164)
第二节 关于文学和文艺学的一般探讨	(167)
一、“文学”一词的多义性	(167)
二、“文学是人学”还是“文艺学是人学”	(169)
三、文学定义未动的“审美”边界	(170)
四、文学定义的历史争点:意识形态性	(172)
五、由语言文本探究文学定义的逻辑矛盾	(174)
第三节 文学是一种审美文本	(177)
一、与权威定义的对照说明	(178)
二、核心词分析	(179)

第四节 边界淡化后的价值问题	(183)
结 语	(187)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色	(188)
二、马列文论学科的历史贡献与发展困境	(192)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方向	(199)
主要参考文献	(201)
后 记	(206)

导论：区分价值分歧与学理之争

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个学科和一门课程，一般称作马列文论。不过本书探讨的是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或者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马恩列斯著作中有关文学理论的原初思想，和俄苏文论中的原始材料，都不是我们的主题，只是在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时可能涉及其中相关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两个小异大同的系统，我们也不讨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存在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原著解读、文学概论之类著述。不过，其核心内容出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两大主题是文艺“为什么人”以及“如何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论争，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两大主题，是思想立场、价值取向及与此相应之实现手段的根本分歧。新中国文论沿着《讲话》精神展开，纯粹的学术论争谈不上重大，能够称得上重大的，就是指导思想、价值目标 and 艺术方式问题，只是可能以文学概念、范畴、命题研究的形式存在。从学术本身来讲，文学理论谈不上重大分歧，可以也应该尽可能保持对话，追求共识，而只有外在的思想立场和价值目标，才有不可调和的成分。至于文学方式，包括文学形式和研究方式，其本身是无争可言的，但当与特定的思想立场和价值目标联系在一起时，就会有特殊的规定性，就会有“民族形式”、“现实主义创作或原则”之类命题的争议。

五四至今，有关文学的争议非常多，这方面的研究著述也很多。哪些争议问题属于与“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两大主题有关的重大问题，我们研究的切入点是《讲话》，以及唯一一个和讲话派文艺思想鲜明对立的理论家——胡风。胡风与《讲话》派并非没有相通之处，双方也在论争中互相吸收，尤其是就比较“纯粹”的文学问题而言。但是，二者存在两方面的根本对立，其一，胡风秉承鲁迅的启蒙立人目标，而讲话派始终以救亡、政治革命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要求为转移；其二，胡风强调文学的特性、作家的特性，事实上要求作家的思想独立和创作自由，以求有批判、超越的思想价值，讲话派强调文学的工具性和作家的使命性，要求思想统一、目标统一。这种根本对立，是以文化问题论争及文学理论争鸣的形式进行，政治家

要以理论方式来缓和话语的强权性,文论家要以学术方式来避免对权力话语的直接挑战,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互相遮蔽,都有着隐晦的色彩。民国时期建构起来的文学概论学科和古代文论学科,新中国成立后建构起来的马列文论学科和西方文论学科,一方面将重大问题论争中的概念、范畴、命题纳入本学科,另一方面又在将这些概念、范畴、命题学理化之后,围绕它们展开论争,将思想立场、价值取向、文学方式之争与学理之争混融一体,因此,既不能够解决政治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也不能够达成文学理论方面的共识,既不能够明确中国文学理论的特色,又不能够消除文学理论话语的狭隘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观念、方法和话语方式不具有普适性,却以“文学理论”、“文学原理”、“文学概论”之类教材和专著的普适性面目出现,而一般文学理论体系实质上包含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的分歧与争议,因而在当代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中失去指导作用,进入学界所谓的“失语”状态。这也成为阻碍文学研究转向的根本障碍。

本书以胡风所经历的五次论争为线索,以胡风文艺思想与讲话精神的分歧为焦点,既阐明论争的实质,也分析这些争点的源与流,将五四至今有关文学的思想立场、价值目标、性质、原则与方法等等根本问题的探讨贯通起来,明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之特色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有随国情而变化的特定文学活动方式与文学研究模式,同时,也剥离出一般的文学理论问题和普适性的文学观念、方法。价值诉求与学理探讨在实际中总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学术研究也有价值诉求,价值实现也可以借助学理方式,但并不等于二者可以混为一谈。本书希望彻底清理价值问题与学理问题混同的学术模式,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和文学理论创新清除障碍。

一、《讲话》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

当前,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是两个热点话题,二者不仅相互呼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为基点,《讲话》不仅成为新中国文艺的基本方针与政策,并且经过文艺理论家的阐释而建构起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形成马列文论和文学理论这两个学科,出现一大批教材和专著。

《讲话》是毛泽东基于对五四以来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从形势出发,根据实践要求而对文艺提出方针与政策性的意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批文艺工作者从敌占区和国统区来到延安,充实了革命文化大军。但是,有些人对于文艺为革命事业服务、文艺家是革命队伍一分子的根本问题认识不清,出现了思想混乱的状况。1942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进行文艺整风。毛泽东在5月2日和23日分别作了两次讲话,阐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文艺创作等一系

列在不同程度上有着分歧与争议的重大原则性问题,明确了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也可以说制定了党的基本文艺方针与政策。《讲话》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群众的立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同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面貌和心理,这样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方针政策基本上是以讲话精神为内核的,虽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有所调整,但基本方向与原则不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观念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这种价值观决定着对文学本质、特性、功用、表现方式、批评标准等等主要文学命题的根本认识。

就政治要求或意识形态要求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但是文学理论毕竟有相对独立于政治的内容,也就是学术或学科本身的内容。因此不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政治意识形态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其中国化还是要在学术领域真正实现。新中国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以《讲话》的基本问题和观点建构起来的。文艺“为什么人”决定了文学的根本价值观,“如何为”则是相应规定了文学的特定形式和方法。文学本质论以政治意识形态性为文艺的根本性质,人民性一直是题中之义,阶级性也曾经是基本观念。基于这种本质认识,文学的根本价值与功用就是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培养社会主义道德,虽然也有审美作用,但首先是为了寓教于乐,其次才是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作家论强调作家的思想道德修养,以及热爱生活、关注现实的精神,同样地,创作论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强调生活源泉——为了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而体验生活,这种现实主义还强调分析生活、干预生活并表现理想;表现形式则是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批评标准自然是政治标准第一,对艺术标准的同样强调与其说是尊重艺术,不如说是以艺术为手段。围绕这些主题,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寻求依据,又从中外文论史中搜寻佐证材料,同时也为其增补更全面更合理的内容,由此形成了马列文论和文学理论学科,这类教材和专著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标志。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和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建构,是统一于《讲话》精神的两大课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课题,中国化的目的就是形成中国特色。何谓中国化或中国特色?《讲话》的“中国特色”,就是始终围绕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呼应时代主题,围绕实践要求,尤其是政治要求。今天来看,“中国特色”

既是继承《讲话》的“中国化”观念与思路,同时也是学科自身的要求:首先,针对全盘照搬俄苏文论,一些学者要从马恩原著那里寻求本源,“自主”阐释;其次,“讲话”派文艺思想在实际运用中受极左思潮影响,不能够根据形势变化做出有效调整,马恩原著又成为批判的武器;现在,面对西方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西方众多新的文化现象和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或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要求以中国的文艺实践和社会实践为本源,紧密结合中国当前的文艺问题和新的文艺现象,而非以经典文献为本源,以政治领袖的言论为教条,充分尊重和接续中国的文学文化传统,建构起中国特色的话语模式和思维方式,而非照搬西方理论和方法。其目的,就是建构起既连接中国传统与现实、具有中国话语和思维特色、而又普适于整个文艺批评和研究的文学理论体系,或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

《讲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它是与当时的社会实践、文艺实践紧密联系着的,也许对于后来尤其是今天的文学现象与问题来说在很多方面不适用,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够否定它是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根本的观念、思路与方法。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也是以《讲话》为核心的文艺思想的继续发展。用《讲话》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和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统一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其实不是两个新课题,而是一个一直在推进研究的老课题。这种推进,既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基本观点与新问题的结合,也包括一些老问题的重新理解与解释。尤其是那些曾经存在分歧与争议的理论问题,既是文学理论的主干问题,也是《讲话》所提出的基本原则与方向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创新的关键。

二、胡风与讲话派文艺思想的根本分歧

“讲话派”一词不大常见。笔者曾于《孝感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发表《两种合理性的冲突——胡风和“讲话派”文学批评标准比较》一文,但没有对“讲话派”加以界定。在本书中,“讲话派”指的是与《讲话》精神一致的文艺思想,包括《讲话》前那些合乎《讲话》方向和原则的文艺思想。

《讲话》的理论渊源,比较直接而显著的,除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瞿秋白外,还有胡适和鲁迅。胡适的问题意识和实证思路启发和鼓励毛泽东关注中国的问题,从实践出发,而不是将主义教条化。鲁迅试图以文学来“引起疗救的注意”,希望“改造国民性”,毛泽东看重文艺的教育作用,强调改造世界观,应当说二者之间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胡风是否对《讲话》有影响?我们认为是。《我的父亲胡风》中提到毛泽东与胡风以《七月》为平台的“交往”:“作为一个国统区的刊物,它居然大胆地发表了报告文学《毛泽东断片》和记录稿《毛泽东论鲁迅》”“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

党和谈,见到父亲时,还向他提到常看他的刊物呢。”^①胡风作为文学批评实践者和理论建设者,强调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毛泽东很可能在阅读《七月》时接触到这一观点,因此《讲话》中要求文艺家们熟悉工农兵生活。思想对话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互相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们可以肯定《讲话》有胡风的影响在内,至于影响程度,那是需要另行探讨的专题,本书为求集中力量于焦点问题,概不过多展开。

周扬是讲话派文艺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并非因为热衷政治和忠于毛泽东才成为代表,而是其思想立场和理论主张本身就与《讲话》一致。由周扬与胡风的早期论争来看,周扬一直注重的是文艺的社会作用,尤其是政治功能,对鲁迅的启蒙思考不感兴趣,也极少考虑文艺特性和作家思想的独立性。瞿秋白和周扬将政治立场理论化了,毛泽东的《讲话》可以自然而然地接着他们说,而可能不会去区分自己的讲话究竟是理论立场还是政治立场,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事实上是在运用政治强权提出要求,因此《讲话》看起来更像是围绕文学理论问题而语重心长地劝导、忠告文艺工作者们。《讲话》发表以后,周扬自己的文艺思想也得到了总结,找到了归依,因此成为《讲话》的代言人和积极推行者。胡风与《讲话》的分歧,便直接转化为周扬与胡风的针锋相对,直至经由周扬剥夺了胡风的话语权。

周扬在1949年就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后来又在北京大学亲自开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讲座,支持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著《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增编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作为新中国的文化部和中宣部领导,在主持大学教材时,他亲自审订了文学理论教材。所以说,周扬是新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和马列文论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周扬及其他学科创始人以带有经典解读和学术史性质的形式来实现这一转换,将《讲话》精神——文艺基本方针与政策学理化,将《讲话》所提出的基本方向与原则,转换为文学理论的主干问题与相应观点。因此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文学理论的一切重大争议问题都与《讲话》有关。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讲话派文艺思想是在多种思想乃至社会力量交锋的过程中形成的,并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出现过很多涉及到根本认识和原则的重大争议。首要的争点是强调文学的政教价值还是人学价值,由此就有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不同,相应强调文艺审美特性还是意识形态性的不同,也就是说,外在的价值目标决定了认识文学本质和根本功用的角度,创作、批评、形式与发展问题都是从属于此的。比如说将文学界定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最初是因为毛泽东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理论家们就要为此提供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说明或论证:文学是意识形态,故有意识形态性,故有阶级性,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文艺自然要强调主要价值和功用。

^① 晓风:《我的父亲胡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第5页。

《讲话》将新文化运动方向定位为政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建设,而鲁迅给新文化运动方向的定位是思想启蒙。启蒙立人是文化主题,是长期主题,救亡和革命是政治课题,是特定时代的主题。前者以文学为人学,后者要求文学为政治的工具,二者是有矛盾的,又各有其合理性,是典型的二律背反。从人性与阶级性之争,到后来围绕主观战斗精神、文学是人学、文学主体性、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从根本上说就是启蒙与革命两大合理性主题的冲突。胡风以鲁迅的学生自居,他骨子里是坚持鲁迅方向的,而和毛泽东的《讲话》有重大分歧。

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刻渊源,因此,这一领域的论争一般通过对马恩列斯文献的不同解释进行,或者围绕俄苏文论而争,回避直接与《讲话》相悖。胡风是唯一一个旗帜鲜明地与《讲话》派文艺思想发生直接冲突的论争对手,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学术批判和政治批判是定位于“反马”而非反《讲话》。此后,再也不会有人如此固执和不识时务地与《讲话》精神针锋相对、背道而驰,所以胡风与《讲话》的对立性质也被淡化。多年以后,学界在为胡风政治平反和学术平反时,便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在胡风与《讲话》派文艺思想之间进行调和性的重新解释,模糊了彼此间的分歧实质,更没有在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或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展史视野中理清这种分歧的来龙去脉。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观念、思路和方法集中反映在《讲话》中,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合乎马克思主义主潮之文艺思想的总结,也是新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胡风“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事实上就是与《讲话》精神相悖。这种相悖,一是他继承了鲁迅的启蒙立人思想,而与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有所冲突,这是两种合理性的冲突,是长期目标和现实要求之间的两难;二是他坚持作家的特殊性和文艺的特性,主要是要求作家思想的独立和创作的自由,而与党的文艺方针与政策相悖,与统一思想、统一目标的要求相悖。同时,胡风从学术角度来探讨文艺问题,讲的是学理,批判者们则是以理论方式来强化实践要求,实际上不是在探讨学术问题。还有,胡风本身也将启蒙的社会实践要求、文艺的特殊规律混为一谈,二者的合理性互相加强而使他愈加坚信自己的合理性,实际上思路不清,理论漏洞甚多。他基于启蒙立人思想而不满文艺方针与政策,表现形式却是在反复阐申文艺特性,而讲话派在政治要求与文艺规律之间既突出强调前者也并未忽略后者,于是胡风显得是无的放矢,无理取闹,顽固不化。后来很多学者没有注意到胡风与讲话派文艺思想相悖的实质,所以从政治上和学术上都予以平反,曾经水火不容的双方就这样合流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严格来说,胡风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讲话派文艺思想就是针锋相对的,二者都有其合理性,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他的命运虽然由于时代的特殊性而过于悲哀,但他在很长时间内失去话语权却是必然的。于他比较悲哀的是,其思想价值不在一时而在

长远,可是由于当时双方都将政治问题与学理问题混在一起,所以其真正价值被掩盖起来,经过解释者们的层层覆盖,后辈学者也很少有人注意到了。

我们具体来看胡风卷入的几次论争:

1. 两个口号之争——两种价值目标的相同与相异

“国防文学”是救亡的主题,它在调整后就成为将救亡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求结合起来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可以被理解为发动人民大众来救亡,但包含了将启蒙与救亡统一起来的内在要求。因此两个口号之争的实质是精神启蒙之长远要求和政治革命之现实目标之间的冲突。

2.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中西价值观的冲突

革命者看到民族形式包含了进步的思想价值,启蒙者则看到民族形式中的落后意识,希望通过革新形式来传播西方现代价值观。

3. “主观战斗精神论”之争——政治命题与学术命题的混同

这场论争的起因是胡风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论主观》中有一些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不同解释,这是学术上的,但文学绝对服从阶级性要求则是政治上的。这场论争是以学术的形式进行政治思想辩论。

4. 典型与形象思维问题论争——思想共性与艺术特性的交织

“典型”和“形象思维”是“如何为”的范畴,就为工农兵服务、建设文化大军这一价值目标来说,“典型”意味着每一形象都能够承载普遍的思想观念,“形象思维”则是为了文艺作品能够打动人,更有效地影响和改造那些缺乏思维能力的大众。

最后,胡风集中反对“五把理论刀子”,同时以自己的“现实主义”来反对几乎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之代名词的现实主义文论体系: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影子,……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①

^① 《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胡风全集》(6),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302—303页。

胡风是在认可《讲话》的基础上,指斥林默涵、何其芳等理解不全,执行不当,但那只是相对于他本人对讲话的理解而言。事实上,五把理论刀子完全针对着“讲话”。

通观胡风所经历的数次论争,可见他和讲话派都将文艺作为批判的武器,都注重文艺的社会功能和作家的使命意识,根本差异在于启蒙方向与政治革命方向,在于思想立场,相应也就有了文学创作方式与原则方面的分歧。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是文学研究的根本观念、思路和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几乎覆盖了现当代一切文论话语,在此语境中,解放前的一切文论话语都经过了重新解释、甄别和改造,解放后,则是只有胡风一度被视为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其他争议都属于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内的对话。基于这一事实,我们由胡风与讲话派文论的几个主要争点入手,重新探析那些曾经存在重大争议而至今仍然存在分歧、或者虽然在某一层面上达成共识但还潜争端的问题。

三、学理之争与价值之争混同的学术思路

对于文学理论或者整个文学研究来说,能够称得上“重大”的争议问题,都是围绕《讲话》的原则和方向展开,这是价值之争,而非学理之争。

胡风与讲话派文艺思想的重大分歧,是“鲁迅的方向”与“毛泽东的方向”不同,是价值目标及实现方式有着根本区别,而不是纯粹文学或学术领域的问题。鲁迅与毛泽东的方向有一致之处,如鲁迅与胡适有关“问题与主义”的争议,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有很大作用,鲁迅在人性与阶级性关系问题上突出后者,也符合《讲话》鲜明强调文学阶级性的精神。因此毛泽东将鲁迅树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主义”和“阶级性”都是关乎文学价值取向的重大问题。胡风侧重解释鲁迅的启蒙意义,很少谈及“主义”,对于阶级性要求多少有点不买账,不认为创作必先有共产主义世界观,必先进行思想改造先行,对于要求写工农兵生活不以为然,认为民族形式包含封建毒素,否定文学价值由重大题材决定。总而言之,就是与《讲话》的价值目标不同。

价值目标由立场决定,理论上无可争辩。因此胡风和讲话派就学术意义上的“文学理论”而言应该是无争的,只是外在要求之争在文艺领域的体现。因为价值之争是围绕文学问题进行,就会以学理探讨的面目出现。政治思想、价值目标取决于国情时势,是主导性的权力话语,是不容争议的。只有当它们以文学问题、学术问题的形式出现时,双方才可以交锋。处于权力弱势的一方,可以自觉不自觉地打着学术探讨的旗号,闪避反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之名而行其实。同时,处于权力强势的一方,也就可以打着学术的旗号,将政治批评转化为学术批评,来回避强权压制学术民主的不合理方式,来消除借助政治权威建树学术权威的心理障碍。

由此导致学理之争与价值之争混同,两方面都难以澄清,反而衍生更多争议。

随着时代变化,政治意识形态之争不断让步于学术论争,也就是价值之争的因素递减而学术性递增,但是原来的许多政治批评话语和思路却遗留了下来,成为学术话语和学术思维的内在成分,同时也将一些过时的问题、观念和见解传递下来,经过师徒相传、话语转换,渐渐地脱离了那个特定时代语境的后辈学者们就不大清楚这其中的传承关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会将本来似是而非的学理勉强地自圆其说,同时,又因为注意力转向西方文论,以及新的文学现象与文化问题,而忽略了那种混同着不同领域、不同逻辑层面之问题的思路。

讲话派将价值要求学理化的思路是这样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为理论支点,由此确定文学定义,规定“文学是什么”,此定义便具有“原理性”,进而规定文学要怎样,也可以说是文学应该怎样和必然怎样。由于规定了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文学具有意识形态性,具有阶级性和人民性。政治在意识形态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文艺要以政治标准为第一。物质决定意识,因此生活决定创作;意识有能动性,因此文学具有认识社会历史规律的作用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作用,作品应该具有严肃性和神圣性,作家应该具有使命感。新时期以后,政治不再唯一,文艺学界便在文学定义中增加了“审美”一词为意识形态的定语,强调文学特性,将审美价值变成题中之义。进一步有的学者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着手,消解“意识形态”一词的“意识形态性”内涵,将其置换为中性的“意识形式”,以求释放文学的多元文化价值,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精神需求。由此可见,时势在变,人们对文学的要求在变,但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确定文学定义、确定文学本质——根本性质、进而确定文学根本价值与功能的思路却没有变。西方文论并不将文学定义看得这么重要,它只是对文学现象与事实的一种概括,是在较宽泛语境中的一种约定,而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文学“原理”。作为一个学科的核心定义,内涵的多次改变固然适应了实践要求的变化,但是破坏了学术思想的连贯性与对话性。或者说,定义随实践要求而变化,就谈不上普适性与对话性,只适用于现在,不能适应于过去和将来,适用于中国的实践要求,却不能够用于解释西方的文学实践和现象,不能够和西方文论充分对话。

最关键的是,将实践要求转换成文学原理,就会形成阻碍实践发展的理论惯性,并且由于价值问题与学理问题混同,价值要求的合理性会掩盖学理上的不足,学理上的自足性又能够掩盖实践要求的不合理,因而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不容易发展。比如说,前些年有学者提倡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我们认为,文学研究纳入新的现象与问题,纳入交叉研究,甚至进入相关领域,都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可争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争议呢?有的学者认为,很多人还生活在温饱状态下,所以不能够放弃文学的使命感,仍然应该强调文学为大众服务的价值与功用;有的学者则

认为应该释放文学的多元价值,肯定人的多元需求,因此可以允许和鼓励对这种新现象和问题的关注。如果单纯就实践要求和价值取向而论,双方不难调和,本来无争,文学可以突出主导价值,兼顾多元需求,文学研究可以继续关注传统问题,也不妨探讨新的现象。但是,双方习惯性地与实践要求转换成学理探讨,以文学定义来确定文学研究界限,由此判断审美化问题研究是否越界,一方认为就文学事实、现象之惯例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不是文学研究,另一方则认为审美是文学的不动边界,那么审美化研究还在文学研究边界内。

再如,学界围绕文学研究是否转向文化研究的争议,引起文学扩容之争。其实质是,有些学者大力提倡文化产业研究,希望为本专业人士争取更广阔的研究领地和谋生机会,寻求新的价值实现途径;另一些学者则不能够摆脱“事业”的观念,并认为产业化破坏了文学的“艺术性”和思想深度,因而排斥文化产业研究。双方完全可以求同或者存异,没什么可争的。但是,学者们回避了这种实质的分歧,习惯性地从学理层面探讨文学定义,一方希望通过定义扩容来为文化产业研究赢得合法性,另一方坚持文学定义而排斥这种截然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研究。结果争议不了了之,还有不少学者没有弄明白分歧的焦点不在“文化研究”而在“文化产业”,也没有对文化产业这一新课题给予足够重视。

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失语,固然是因为观念和话语多元共生、问题与现象日新月异、方法与范式形形色色,但更主要的是内在思路不清,价值问题与学理问题混融的理论结构没有根本转变。理论研究应该保证术语内涵明确,问题有连续性,总结与概括实践,但不轻易随特定时期的特定实践要求之变化而变化;实践问题则首先要就事论事,不一定要与理论挂钩,甚至转换为理论探讨。真正的支点不是理论,而是实践现象的考察,真正的切入点应该是实践现象本身,而非由原理出发。

因此,文学理论要与时俱进,要适应全球化趋势而保持中国特色,学术研究要健康发展,应该从彻底解决那些曾经存在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入手,理清文学理论发展的思路,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在区分开的基础上重新确立其联系。

四、本书的主要议题

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重大争议问题,本书大致按出现时间顺序列出人性与阶级性之争、典型问题论争、两个口号之争、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主观战斗精神论”之争、形象思维问题论争、文学定义与边界之争等议题。有些争议是一直延续或多次反复的,或者以变种形式再现,我们将其归类梳理。

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覆盖着整个文学研究,所以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思潮发展史中的几乎所有论争都可以视为本书的探讨范围。不过我们并不面面俱到,而是力图抓住那些在今天还具有对话性的、对于解决当下文学问题还有意义的争点。